

被释放的疾病:1990年代以来 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刘文祥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就乡土小说而言,有关疾病讨论虽然比较早,但疾病叙事一直未构成较大的声势。早期乡土小说中疾病为“问题”所遮蔽,疾病叙事更多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不太清晰的“患病”叙事。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几年中,疾病叙事开始在乡土小说中大规模出现,疾病不再被压制,而是被释放出来,呈现为清晰的命名和结构。在疾病叙事中,大量的癌症意象替换了早先的肺病意象,这隐喻着乡土精神维度的日渐消失。乡土书写日渐逼近最后的、残缺的、本体,并在喧闹的葬礼中被终结。表面上看,疾病侵蚀的是主人公的身体,深层上则是隐喻了当代乡土社会的内在痼疾。疾病书写是乡土尴尬的处境催生的,当乡土越来越从一种绝对价值体变为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复合体的时候,持续的焦虑弥漫在书写者的心头,疾病也成为解释乡土的最恰当方式。从疾病角度看待乡土,并不意味着作家获得了某种新的启发,相反,其却会掩盖乡土社会本身的某些结构性问题以及可能的革新元素。

关键词:乡土文学;乡土小说;乡土社会;疾病;疾病书写;焦虑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6-0145-08

疾病一直与文学有着扯不开的关系,“作家因其身心状况比常人更多体验、更善表达这一生命经验和人性内容,因而病人和文人、病况和文况,就有了更为普遍的人学和文学的意义。”^[1]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有关疾病的书写虽然比较早,但是真正留给乡土文学的想象空间一直较为有限。然而,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几年中,疾病书写开始在乡土小说中大规模出现,疾病经过旅行,迁徙到乡土文学中,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乡土解释框架,甚至逐渐挤占乡土文学的叙事空间。时至今日,有关乡土疾病书写的讨论却很少,少数研究者就贾平凹、阎连科等乡土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但这些作品的横向关联和深层意义都没有得

到有效的开掘。在挽歌声中,充满疼痛的乡土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命名和恰当的构型来为自己的“病躯”塑造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愿望不仅普遍清晰,也颇具探究的必要性。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何以能够与疾病产生大规模的关联?又发生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有关疾病的想象方式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分析的问题。

一、从“患病”到“疾病”:乡土小说 疾病书写的过去与当下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乡土往往是诗意的存在,有优美的风光、静谧的自然、其乐融融的人际

收稿日期:2019-07-14

基金项目: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哲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2019CXTD015)

作者简介:刘文祥,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关系,这些都是乡土非常吸引我们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少描写乡土苦难的作品,即便是浪漫色彩再浓的乡土作品,能让我们联想到的也只是贫穷、灾害和动荡。文学中的乡土其实离疾病一直是比较远的,疾病更多是属于城市,老舍、沈从文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可谓代表。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乡土文学中的疾病书写确实比较少。从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疾病的书写便在似是而非之间被引入了,说其似是而非,主要是因为疾病总是在“热病”“寒症”“痲病”以及诸多含混不清的字眼中被陈述出来,这些大部分都是指肺病及并发症,鲁迅的《药》《在酒楼上》《孤独者》、王鲁彦的《病》《河边》、王统照的《山雨》等为数不多的乡土作品都有过对这些疾病的描摹,疾病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绕行,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孱弱的象征,而非一种具体的疾病。“在症状之外不再有什么病理本质:疾病中的一切本身都是一种现象;就此而言,症状扮演着一个纯朴的、最自然的角色。”^{[2](P100)}按照医学社会学的分类,疾病主要可以划分为疾病(disease)和患病(illness)两类,疾病是一种现代医学框架内的客观事实,而患病更多意味着一种主观体验和感受。这里我们可以拿王鲁彦的《河边》进行分析,故事中明达婆婆在家里等待着儿子回来带她去看病,到底是何病不得而知。后来儿子回来带她去医院,路过庙里拜神之后,她瞬间感到自己从神那里获得了庇佑,故事戛然而止。这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患病者形象,所患疾病为何、救不救治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更喜欢关注社会问题,疾病为“问题”所遮蔽,这一时期的疾病叙事更多意味着一种患病叙事,病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是一种不确定、未知的东西。这种指称的乏力本身就昭告:患病只是一种临时想象,一种符号拟造,亦或是一种命题假设。

在后来的发展中,乡土文学也开始变得倾向于蔑视疾病,在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书写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病痛突然大面积消失了。只有寥寥几个文本对此有所涉及,如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马烽《金宝娘》中的金宝娘都患有某种性病,《陆康的歌声》中主角陆

康患有风湿病。但是在作品中,叙事者又一再强调他们的疾病是外来的;贞贞、金宝娘的疾病为日寇传染,陆康则宣称疾病在来延安之前就有了。解放区的这种“疾病的隐喻”明白地昭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外在原因,并不是内生性的。而且疾病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磨砺身体的有效方式,如莫邪的《“我这里还有一挺”》中史根和因为患疟疾而错过了战斗,疾病不仅没有让他死亡,反而激发了他的战斗意志,让其成为战斗英雄。在这种疾病书写中,乡土是健康的,健康的乡土不可能生病,疾病话语也不可能侵入。乡土以自身的强大昭示:它本身并不必然与疾病相关。

在新时期诗性乡土的复归下,我们仍然变得忽视疾病,以致于我们今天转身阅读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恍然间发现,各种疾病如同虱子一样逐渐爬满了乡土这幅华丽的长袍。乡土疾病叙事正在呈现前所未有的蔓延趋势,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出现的,疾病叙事逐渐从“患病”走向客观意义上的“疾病”书写,这在以下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圣手,几十年来以关注乡土变迁著称,疾病便是其重要的书写主题,《高老庄》《古炉》《秦腔》等代表作品中病象丛生。如《古炉》中:“古炉村里许多人都得着怪病。秃子金的头发是一夜起来全秃了的,而且生出许多小红疮,婆让他用生姜汁抹,拿核桃的青皮和花椒籽一块捣烂了涂上拔毒,都没用。马勺娘一辈子心口疼,而马勺又是哮喘,见不得着凉,一着凉就呼哧呼哧喘,让人觉得他肚子里装了个风箱。来运的娘腰疼得直不起,手脚并用在地上爬了多年。六升的爹60岁多一点就夹不住尿了,裤裆里老塞一块棉布。跟后的爹是害鼓症死的,死的时候人瘦得皮包骨头,肚子却大得像气蛤蟆。田芽她叔黄得像黄表纸贴了似的,咽气那阵咽不下,在炕上扑过来扑过去,喊:把我捏死,把我捏死!谁能去捏死他呀,家里人哭着看他这折腾了一夜,最后吐了半盆子血人才闭了眼。”^[3]另一位乡土怪病书写的爱好者——阎连科,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的《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因为患“堵喉症”,皆活不过40岁,整个村庄都处于疾病的威胁之下。鲁敏的“东坝系

列”也是一幅病像图:《逝者的恩泽》中达吾提患眼病,红嫂患乳腺癌;《白围脖》中父亲患心脏病;《盘尼西林》中“盘尼西林姐姐”患性病等。范小青对疾病书写也特别敏感,写出了一系列乡村之病:《病历》中的神经分裂症、《伏针》中的面瘫、《药方》中的痒症等。艾滋病也开始进入乡土小说中,如阎连科的《丁庄梦》、宋江鹏的《艾滋弃儿》、罗伟章的《回龙镇》等都是对艾滋病关注的文本。还有一些其他绝症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如李锐《无风之树》中的大骨节病、余华《活着》中的软骨病、李西闽《死亡之书》中肆虐的狂犬病……当然,乡土疾病书写的集大成者还是张绍民的《村庄疾病史》,乡村几乎汇聚了所有可能的疾病:忧郁病、中毒、淋病、产后病、破伤风、腰痛、黄疸、瘫痪、肺结核、癌症、尿结石、狂犬病、疥疮、脑膜炎、隐痛……。疾病笼罩着每个人的生活,让他们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除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之外,乡土小说中书写呆傻、精神病等残疾病症的也大有人在,如《尘埃落定》《秦腔》《白鹿原》《受活》《纸醉》《白衣》《歇马山庄》《我的名字叫王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残疾病症进行讨论,残疾病只是一种残缺的象征,并不是内发的、致命性的;而疾病有一种原始的性质,在乡土不可更改的变迁面前,无论试图用什么残疾病来折射,都不如内在性疾病更为恰切,也更具说服力。

二、释放、倒错与肆虐——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 疾病书写的形态与变化

通过上文对1990年代以来乡土疾病叙事的梳理,我们会吃惊地产生疑问:为什么作家们开始突然间变得喜欢谈论疾病了?疾病何以能够与乡土叙事产生如此紧密的关联?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疾病书写出现了什么样的形态变化。具体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书写形态。

(一)从压制到释放

疾病不再被压制,而是被释放出来。疾病在乡土文学中一直以群像存在,“病夫”、“东亚病夫”是

对国民/农民的羞辱性称谓。“病夫”意味着疾病是在群体的名义下为现代性所审视,同时也意味着疾病是被压制的。鲁迅的《药》中,疾病被局限在身体里,被视为一种禁忌,其治疗也被局限在私密空间中。在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疾病开始被大规模的生产、发掘、移植,疾病开始热衷于展示自身,倾向于解放自身,大量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疾病拥有了一种景观化的特征。景观化意味着疾病不再是难以见天日的东西,疾病开始被发掘、被排列、被呈现出来,一切只为被观看和凝视。景观化将疾病一一罗列而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村头到村尾,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再是秘密,患病不再是羞耻。如《村庄疾病史》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疾病归宿,刘再男的糖尿病、刘再王的咳嗽、刘土甲的淋病、张一乐的疔……叙事者如同熟稔的医生,“能够度量它们,比如能够断定脉搏的力量和速度、发烧的程度、疼痛的强度、咳嗽的剧烈程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症状。”^[2](P156)一次症状引申出另一种症状,一种疾病煽动另一种疾病,疾病现身说法,把自己的秘密揭示出来,形象生动,发音准确,充满了令人恐惧的面容。这是属于疾病的当代乡土:不再是虚构,而是真实;也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释放。在以前,疾病是弱勢的,突破不了“身体—乡土”话语联结,身体强势的背后是乡土的强势,这种强势是文明赋予的,其得源于乡土主体身份的历史性,也即农业文明的强力支援。在“五四”时期一边倒的文化处境下,乡土可以被视为固执、保守,亦或愚昧,但却从来没有被征服。乡土主体是压倒疾病的,即使它是一种残缺的、混沌的东西。而今,疾病轻易地突破了束缚它的东西,也从反面印证了乡土自身的衰落。

(二)从“病夫”到病体

乡土疾病叙事焦点也在由“病夫”转向病体,使得疾病获得了清晰的结构,被赋予了本质性特征。前文我们讲过早期乡土文学对于疾病指认的模糊性,这使得疾病找不到自己的逻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根据,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命名,乡土之“病”被认为是臆想。尽管乡土书写中知识分子相当地愿意使疾病清晰化,但是在潜意识中又不愿

意面对病痛的现实,不愿意面对腐朽丑陋的国族病体,其结果是疾病书写的似是而非、欲言又止。进入1990年代以后,疾病被从散落、破裂的当代乡土现实中抽离出来,它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表达,并开始认清了自己的结构和话语陈述方式。它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清晰的:“痲病在汤云天生活的年代,被视为不治之症,但并不是死的很快的疾病。他的身体里不断地灌溉一些草药熬成的药水进去,药水带着它的内容在祖父的身体里去修改,修改另外一些内容。他吐出来的痰被他侄儿用石灰或草灰覆盖,他们把痰作为传染疾病的事物。”^[14]在这样的疾病叙事中,疾病的名称、症状、发病原因都是清晰的,疾病叙事改写了自己的模糊逻辑,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在命名、描述之间游移;疾病不再是模糊的,也不再是一种经验的解释。而且在当下乡土小说中,叙事者将疾病放置到一个人的介绍中,疾病先于个体出场,挤占个人的话语空间,并构成了个体最为本质性的特征,如《日光流年》的开头便是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在《高老庄》里,子路回乡祭祀,需要南驴伯指导,南驴伯一出场就是以虚弱的形象出现的:“南驴伯虚弱得像个纸人儿,头上扎着一条带子,一边指点最后一个灶的位置低了,一边对子路娘说,他昨日晚上梦见子路爹了……”^[15](P29)很快,南驴伯死于癌症。刘庆邦的短篇《后事》中,母亲一直是以受难者的角色出现的:“毒瘤如毒虫一样折磨着我的母亲,把我心疼得要命。我对毒瘤恨得咬牙切齿,可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母亲的痛苦,让我知道了病的厉害。每个人一生的敌人不是别的,都是自己身上的病,最终都得被病所打败。”^[16]这样,疾病开始被强调,成为超越身体的一种显性存在,成为左右身体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福科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出,分类医学的建立是现代医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过于关注疾病使得原本重要的身体不再受到重视。乡土小说对疾病清晰化表述的背后,意味着人已经不再成为乡土的中心。疾病开始突破“身体—乡土”话语联结,疾病与乡土分裂,并使得疾病形象越来越清晰,乡土形象反而越来越模糊。一种认识论在此扭转:不是乡土而是疾病成为了作家关注的焦点。

(三)从慢性病到绝症

乡土小说中疾病的隐喻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意味着乡土书写逐渐丧失了它的精神性和延伸,被迫返回本体。疾病一直以来都是以文化的隐喻著称,这是因为疾病善于拟造想象,它上可以勾连国族叙事,下可以与本我对接。所谓的“病夫”首先暗示了病人是一个劳动者,是乡土性确立的一种方式,从“病夫”到病体的变化,意味着乡土已经失却神圣性、浪漫性,所谓的诗意想象、所谓的历史内蕴、所谓的天启真理都已经荡然无存。苏珊·桑塔格指出:“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17]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疾病便是肺病,而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中,最能够代表乡土疾病的便是癌症。张宇的《乡村情感》、雪漠的《大漠祭》、贾平凹的《秦腔》、王华的《花村》、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等都有对癌症的描写,但是这些惨烈程度都不如贾平凹的《高老庄》。《高老庄》中的癌症可谓一大景观:劳斗伯得的是肝癌,驥林他爹得的是鼻癌,子路父亲得的是胃癌,南驴伯得的是喉癌……正如原文说的那样,“高老庄这七八年里患病的人多,一检查都是癌症,又几乎是挨家挨户地死人,有人就说白塔是高老庄的风水塔,塔倒了,白云湫的邪气垂直冲过来才导致癌病这么多的,曾提议集资修塔,可塔还未修,这场雨使牛头嘴也冲了。”^[18](P86)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恰切的疾病表达方式,肺病是抑郁病,肺病流行于“五四”时期,是精神愤懑的象征,肺病充斥着高雅的气质;癌症则意味着身体性,是一个不体面的存在,它意味着一种慢性的折磨,一种无可挽回的抗争,一个毫无未来的绝望主体。从肺病到癌症的隐喻转化意味着:乡土书写开始逐渐丧失了它的精神性,所有的延伸开始被消灭,乡土逐渐裸露出最后的、残缺的本体。这个本体,既是人物的身体,也象征着乡土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完型结构,如农业生产、家族血缘、伦理秩序和民俗习惯等构成乡土本质性的元素。疾病书写从双向瓦解了这个本体:一方面,疾病叙事挤占了这些

话语可能存在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乡土叙事需要凭藉这些本体性元素展开自身的延伸,比如《白鹿原》从白鹿村的生活、生产出发展开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反思,而现在本体已被腐蚀,乡土叙事开始失去了最后的凭据。乡土把浪漫留给了昨天,把精神留给了过去,最动听、最活跃、最富想象的东西都在迁徙,而最笨拙又最危险的身体却在当下沦亡、消散。

(四)从救治到无药可救

疾病的释放既能够从肆虐行动中得到证明,又能够在疾病的对立面——医生尤其是救不了疾病的医生那里得到确认。疾病生存于身体中,疾病需要被察觉、被分裂、被校正,疾病的沉默,唯有依靠医生才会得以展现,二者从来都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从晚清开始,疾病就与医生密切相关,最为典型的是《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他走遍各地,医人又医国,拒绝把疾病当做秘密,想方设法地把它揭发出来,这个时候的医生焦虑而又自信;在“五四”时期,乡土是庸医/巫医盛行的时代,它构成了疾病的不对称结构;在革命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中,医生是大于疾病的,疾病彻底无躲藏之处;而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中,医生面对疾病,则是束手无策的。疾病不再被治疗,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被治疗,相反,疾病将医生驱赶得四处躲藏,在对疾病的屈从中削弱了自身,完成了反身解构。比如《秦腔》中的医生赵宏声也对疾病束手无策:“‘那这是啥原因?或许是命吧,再好的医生是能治病治不了命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便取了几瓶治癌的中成药,撕了瓶子上的药名贴纸,给了夏雨。”^[18]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中的万泉和也是以乡土医生角色出现的,万泉和在后窑村能够立足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明,而是乡邻对他的宽宥。他在治疗中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医生形象,他面对脑膜炎、肝硬化、结石等疾病束手无策,将病人拖延成残疾,甚至误治而亡的也大有人在。《古炉》中有一位奇特的医生“善人”,他善于用传统中医揭魅的方式帮助病人认识疾病,但是在治疗效果上越来越力有不逮,乡民的病情越发严重,他最终意识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绝望地离去。医

生的出现与一个时代的自信、文化缺失存在着密切关系。当疾病肆虐乡土的时候,医生的出现暗喻了乡土被凝视、被抚摸、被关注、被救治的渴望,但医生却走向了它的反功能和不及,这显示了始终周游于乡土书写者意识中的无奈与困惑。

(五)从葬礼的缺失到大规模出现

疾病超越了身体,还试图埋葬身体、埋葬乡土,在葬礼中宣告自身秩序。在过去,葬礼是俭省的、缺失的。以鲁迅为例,他笔下的人物各有自己不同的死亡归宿,如夏瑜、孔乙己、祥林嫂、陈士成,但是作者并不倾向于为他们举行葬礼,因为仪式意味着秩序。五四时期人们喜欢解构秩序,唯一的魏连殳也是简单交代一句“正屋里却挂着白的孝帏”。我们观察当代乡土小说写作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葬礼仪式开始大规模出现,这是在以往乡土文学创作中很少出现的。如果乡土给予疾病的是一个剧本,那么疾病回馈乡土的却是最高超的表演——葬礼。葬礼是疾病的一种延伸,是疾病为自身准备的一个结构,更是一次“身体—乡土”之死的宣告。1990年代以来的很多乡土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葬礼描写,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秦腔》、刘庆邦的《响器》《后事》《葬礼》、阿来的《空山》、赵德发的《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李锐的《无风之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雪漠的《大漠祭》、安琪的《乡村物语》、叶炜的《福地》、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马金莲的《长河》《马兰花开》、李佩甫的《李氏家族》《红蚂蚱 绿蚂蚱》、田耳的《衣钵》、陈应松的《坟地》、陈继明的《举举妈的葬礼》……。疾病不仅宣告了乡土的生存状态,还完成了对乡土的最终审判,书写葬礼意味着——必须以昭告的方式诉说主体死于疾病。而且绝大部分的葬礼书写都显现出了一种隆重的姿态、喧闹的喷呐、悲恸的哭嚎、成群的孝子、有序的仪式。葬礼成就了一种让我们疑心的精致:没有任何时代的乡土像今天这样偏爱葬礼,也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这样写得精雕细琢、事无巨细。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个专门以喊丧为职业的角色——罗长礼,“罗长礼长个鸡脖子,一般鸡脖子声细,罗长礼却

声粗,且不怵场子;场子越大,他越精神。平日人穿皂布,丧事时人穿白衣。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嚎哭。”^[9]在乡土普遍沉默的年代里,人们这样评价他的喊丧:“嗓门真大,五里开外都能听见。”在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婚礼而不是葬礼是乡土文学中最壮阔的景观,尤其是解放区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的婚礼场景,而现在,葬礼却频频粉墨登场,实现了对婚礼的压制。比如王祥夫的《婚宴》,整个作品一直讲述着高超的厨师父子怎么为主家做出了丰盛的婚礼宴席,但是结尾笔锋一转,原来是他们家办的阴亲;张宇的《乡村情感》中,麦生伯得了癌症,为了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儿子火速成亲,结果婚礼刚方便举行葬礼。这是葬礼对婚礼的胜利,前者对后者在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压制也非常明显。葬礼是疾病的胜利,葬礼也让乡土看到了自身主体性的失衡,书写葬礼也由此成为乡村最后的挽歌——乡土已经穷尽所有,几近沉默,只能通过葬礼来宣告在场。

三、“被围困的乡土”:疾病想象的必然性及限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前乡土小说并不善于表达疾病,或者无法表述疾病,现在疾病在作品中变得具体而可见,嚣张而泛滥;早期乡土文学中,我们把乡土社会当做一个问题来对待,疾病仅仅是个中表述之一,对于疾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尚不可知,如今我们把乡土当做疾病来看待,疾病成为全部的问题所在。疾病曾经从乡土里被抽象出来,现在却不得不被还原回去,历史看似是经历了一个轮回——而疾病不再是以前的疾病,乡土也不再是以前的乡土。疾病叙事的变化折射了1990年代以来乡土社会的某些内在变化和结构性崩塌。

在过去,乡土自身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体,凭借着长久的文明积淀和意识形态庇佑,可以无限地去表象世界自身,它能够产生知识、判断、真理,能够与政治、经济、阶级话语产生诸多的关联。乡土是价值的源泉,它不允许被侵犯,也不可能产生内

生性的疾病。1990年代是现代化全面开启的时代,现代化使得以往乡土稳定的共同体和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乡土社会中的“留守村”“空壳村”比比皆是,乡土世界里未经认识的文化与文明越来越少,乡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乡土社会中新的经济、文化现象层出不穷,用以往的知识 and 理论是很难解释的。按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看法,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都在寻找自己的广延或空间,一旦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拥有了确定的知识和表达方式的时候,便会走向僵化,不再有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也就意味着其走到了终点。反观我们的乡土社会,正是在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和伦理本位的秩序结构完善之后,失却了变迁的内生力量,并开始被都市、物质、消费所抽离,从完全自主的文化所有者成为边缘的沉默者、商业文化的屈从者和内在矛盾的持有者,在这个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时代里,死于一种“经验的无能”。乡土曾经的辉煌已经被遗忘,乡土变得既没有轰动效应,也缺乏接续力量,或者借用齐格蒙特·鲍曼的一个词语,成为一种“被围困的乡土”。乡土的处境使人们认识到它的有限性,正如人们对自己健康的认识一样,乡土一样也是会生病的,乡土已经不再与真理、历史等宏大话语结合,乡村已经不能够代表什么,只能够代表它自身——一个虚弱的、被征服的历史主体。

乡土文学的意义在于解释社会,但是当代乡土文学在解释乡土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力不从心。乡土处境及周边的变化难以被原有的叙事方式所描述——它的中空、它的肢解、它的消散,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东西都需要新的表述。但对于特定时代的乡土作家而言,处于乡土陨落的年代,他们不得不一直面对这样的书写难题:在理智上将乡土判定为不合时宜,在情感上却又不得不继续维持这种似乎没有前景的写作。如在雪漠的《大漠祭》中,憨头因为癌症将要死去,但是在死之前,家人都没有放弃希望,而是请来神婆做法,希望能够延长憨头的寿命,“神婆的禳解仪式简单,不写牌位,不念祷文,向来是直趋目标。焚香燃表之后,齐神婆上了炕,拿过一叠五色纸,在憨头身上绕来绕去,念叨:‘燎利了,燎散了,活人冲了燎利

了——”^[10] 这种祈禳叙事在早期现代文学中便非常常见,随着文明的发展,在乡土叙事中它逐渐消失了,但是在这里又突兀地出现——作为一种迷信的东西,作者自然清楚它不可能发生实际作用,但仍然进行了详尽地描述,这样的仪式与其说是驱赶疾病,不如说是在给乡土招魂。处于焦虑处境的写作往往会丧失表达,任由主体被无意识所驱赶,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认识对象,甚至不知道对象到底是什么。从求助医生到求助神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拯救乡土都成为了必须被表达的主题,无论内部的逻辑是否混乱。

1990年代以来,乡土作家们忽然间不自觉地对疾病产生了兴趣,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被构想、被明晰,从侧面证明乡土已经积攒了太多的愤懑,想急切地把自己的痛苦揭示出来。唯有通过疾病叙事,作家对于乡土的敏锐感觉和悲切经验才能得以传递。在疾病和死亡的光亮照耀下,疾病被解放并变成了乡土叙事的核心,乡土也藉借疾病叙事真正地解放了自己,它不可见的秘密和可见的痛楚都被揭示。于作家而言,疾病书写也是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斯特拉桑在《身体思想》中指出:“所有的身体状态都存在一种精神要素”。乡土本身并不必然与疾病相关,但是在现实的催化下,在传统的乡土叙写模式失效的背景下,想象疾病便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在乡土文学中,想象疾病似乎有着这样的病理学支撑:“个人经历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11]作家把对乡土的焦虑转化为身体的痛疾,疾病也成为最恰当的解释方式。正如《高老庄》中所表达的那样:“自父亲做过了胃癌手术,整整的四年里子路的负担多么沉重,每日的清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害怕着这一天父亲的病情会不会复发?以至在讲台上正讲着古代汉语,思路就突然中断了。为了逃避焦虑,他去了历史博物馆观看新出土的大唐壁画,壁画里最让他感动的是唐人打马球,瞧呀,那马臀部滚圆,四足精瘦,奔跑起来蹄脚腾空几乎平行啊!”^[15](P10)对生

病的父亲/乡土的焦虑呼之欲出。在乡土写作中,作家解放自我的潜在逻辑是:如果受煎熬的作家能够将焦虑附着到某种东西之上,确实可以减轻痛苦。疾病可以看作是缩小自身生存空间的一种有效方式,随着自身肩负的世界的弱化,主体不需要再为生病的客体所负责。因为乡土疾病角色的获得,能够让我们获得责任免除。于是乡土书写者开始解放疾病,把疾病景观化,疾病不需要暗示,不需要羞羞答答,直接登堂入室。这种疾病想象还不能像早先那样不疼不痒,疾病不能再被视为自然化状态,它必须产生出应有的力量,实现从肺病到癌症的隐喻变化,或者与葬礼联姻,和死亡缔缘,否则便不会被引起注意。

所以,释放疾病就是释放我们自身,这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危险的举动,也内含着很多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对于当代乡土作家而言,他们显然还缺乏应对乡土变化的心理准备和创作能力。所以,在乡土社会的现实剧变面前,只有通过对身体、疾病的想象来重述乡土,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饲养,亦或自我反噬——这就是乡土作家的不安和混乱。他们不仅要自身命运交付于作家认同的东西,而且还取决于所否认的东西,疾病而不是乡土成为表述的中心,这种认识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家在艰难的乡土叙事中获得了某种新的启发,恢复了感知,实现了乡土重建——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旧有经验的断裂,一种无奈的构想。从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几年的这些乡土疾病叙事,既是一次挽歌式的、玉碎式的书写尝试,更是一种想象力枯竭的表现。在疾病书写中,很多作家描述的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乡土,而转型中的乡土不仅有消散,更有重构和新生,这些也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所以,疾病使得乡土在被显示、被具象化的同时也在隐匿。疾病推论并不一定有利于乡土本来面目的还原,疾病也会掩盖转型期乡土社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可能的革新元素,这也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参考文献:

- [1] 邹忠民.疾病与文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4,(12):67.
- [2] (法)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3] 贾平凹.古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49.
- [4] 张绍民.村庄疾病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42.
- [5] 贾平凹.高老庄[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6] 刘庆邦.后事[J].花城,2011,(6):152.
- [7]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8.
- [8] 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52.
- [9]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19.
- [10] 雪漠.大漠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20.
- [11] (美)凯博文.疾病和痛苦的社会根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49.

【责任编辑:周琍】

Released Diseases: On Disease Writing in Rural Fiction since 1990s

LIU Wen-xiang

(College of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Abstract: Although diseases have long been discussed in rural fiction, but disease narration has never made a huge momentum. In early rural novels, diseases were clouded by “problems”, and disease narration was then more of a subjective and obscure “affliction” narration. From 199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disease narration began to appear on a large scale in rural novels. Instead of being suppressed, diseases are liberated and clearly presented with nam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narrative of disease, a large number of cancer images have replaced the images of lung diseases, which is a metaphor for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e countryside. Rural writing is approaching its final fragmented subject, and is terminated in the noisy funeral. On the surface, the disease invades the body of the protagonist, but in a deep sense, it is a metaphor for the inherent problem that plagues contemporary rural community. Disease writ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When the countryside transforms from an absolute value body into a value complex of relativism and constant anxiety fills the writer’s mind, the disease becomes the most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countryside. Looking at rural areas from perspective of disease does not mean that writers have obtained some new inspirations. On the contrary, it may cover up some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possible innovation elements of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rural literature; rural fiction; rural community; disease; disease writing; anxiety